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汇集



主编 铁木尔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汇集



主编 铁木尔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汇集/铁木尔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660-0074-3

I. ①内… II. ①铁… III. ①蒙古族—家族—史料—内蒙古
②地契—汇编—内蒙古 IV. ①K820.9 ②F32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8838号

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汇集

主 编	铁木尔
责任编辑	雨 山
封面设计	贾豪俊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春飞无限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 数	340千字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074-3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的亲人和家传契约

代序言

铁木尔



本书主编铁木尔的祖父，
摄于1940年



本书主编铁木尔的祖母，
摄于1940年

今年4月1日，我和弟弟妹妹为年迈的父亲过生日。那一天是父亲八十八岁生日，按照民间的说法，是他的米寿之日。我们多想向父亲打听一些久远的家事，但父亲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了，他只剩下一点点残留的记忆。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病，岁月侵蚀了他敏捷的大脑。当我也已年过六旬、步入老年、健康每况愈下时，我会时时涌出一阵深深的悔意：我应该早几年和父亲多聊啊……

我的手里放着两百多张祖传的契约，是从清朝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陆续累积而成的，它们是真实的历史文书。我知道我们一家必须把它们公布出来，以供社会研究，我知道这是我们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自己和我的弟弟妹妹都无法对这些文书进行专业释读。现在从年迈的父亲那里也已经寻找不到更多答案了，只剩一种可能：靠我自己的回忆，靠向亲友调查，粗略地记录我的祖父和父亲两代人的故事，并向将要成为本书读者的朋友和亲戚简要介绍一下契约的来历，然后把那些发黄的契约文书影印出版，交给社会去了解，去研究，去挖掘它们的价值——我毫不怀疑它们的价值。

我家姓金，内蒙古土默特人。我的祖父叫达木切，但经常被译写成达木欠（契约中也如是）。“欠”字在当地的山西口音就发音“切”，这个词不是蒙古语，而是藏语。16世纪以来，蒙古人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取用藏语名字很普遍。祖父的名字含义很好，意思是上法、妙法。我问过爷爷有汉语名字吗？爷爷说他叫金万富。可我从未听别人这样称呼过他。



本书主编铁木尔的父亲、母亲，
摄于1948年至1949年

祖父生于1896年（丙申年），属猴，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农民。虽然他年轻时曾经在地方保商团当过差，为旅蒙商当保安，但时间不太长，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种地。20世纪50年代前期土改时他只有九亩地，所以被划为贫农。一个贫农保存着两百多份契约文书，一定另有缘故。他的先人一定曾有过较高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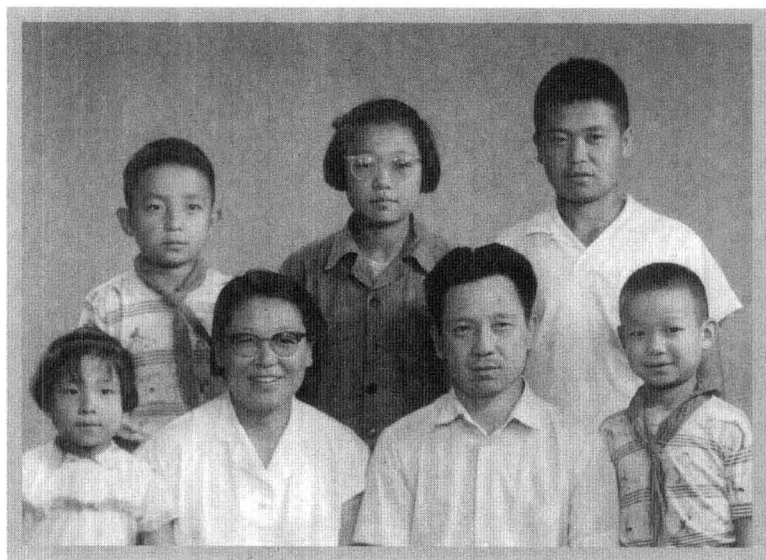
我对祖父的印象很深，他的身材高大、匀称，在那个时代，他是村里的大个子。因为我是长孙，少年时我有不少时间跟他在一起。那时我们随在城里工作的父母住在呼和浩特，祖父还在乡下。可是所谓乡下其实离市区很近。呼市西郊有个小村，村名叫“当浪土牧”，意思是“七万”，在蒙古历史上是古已有之的称谓。差不多50年前听父亲说起过爷爷的前辈曾住在离毕克齐不远的马群。从爷爷的上一代迁到这里，据我姑姑说这是爷爷母亲的老家。当浪土牧距离呼和浩特旧城西茶坊不过十华里，是一条土路。中途有条小河，叫五里沙河，但时常没有水，还有一座小木桥。有一年夏天我亲眼看到桥被洪水冲垮的情景。当浪土牧现在几乎被城市包围了，东边是市区，西边有开发区。那时祖父会被父亲接来到我家住一段时间。但他总说在城里住不惯。少年时我最渴望的是随祖父回村。夏天可以到瓜地里吃瓜，最好吃的香瓜叫灯笼红，个儿比较小，但是香甜可口，应该是香瓜之最，这个品种可能因产量低早就被淘汰了，但它的美味至今无法忘记。个儿大一种叫虎皮脆，现在也基本见不到了，类似外表的也许是它的变种。

村南大约一公里，有一棵粗壮高大的柳树，树冠像个巨大的圆球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村里的老乡都说：“看那棵树风水多好。”我家的坟地就在那儿，是我爷爷父母和我奶奶的墓地。后来我爷爷、二爷爷也葬在那里。树据说是我爷爷和他弟弟种的（不过从小我就有疑问，树干直径将近1米的大柳树树龄是不是不止几十年，可惜我没有直接问过爷爷）。爷爷原来的瓜地就在那儿。估计合作化以前单干时我爷爷的九亩地都在那儿或有一部分在那儿。集体化以后，那儿是集体的菜园子，我也在那儿吃过西红柿、黄瓜。“学大

本书主编铁木尔与祖父、
父亲、母亲、姑姑和妹
妹，摄于1951年



本书主编铁木尔与父母及
弟弟妹妹们，摄于1965年



寨”时平整土地，把我家坟地也平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姑姑经过交涉，把祖坟那块地要了回来。前几年我们兄弟三人回去跟父亲和姑姑对墓地进行了简单整修，立了碑。

祖父家有一排小小的四间土房，北墙顶就是屋脊，由北向南斜下来。屋顶没有瓦，每年都要用掺了麦秸的泥抹一遍。这种房子当时很普遍，就是为防止冬季屋顶积雪长时间不化。爷爷和一个叫李明的老头住东头，二爷爷和他女儿住西头，包括老哥俩一人一间更小的凉房。别看离呼和浩特市那么近，还要用煤油灯照明。李明是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雇农，无儿无女，爷爷收留了他，两个老人一起生活。我父亲和姑姑叫他老李大

爷。两个老人相处极为融洽。爷爷家几乎是家徒四壁，连个竹皮暖壶都没有。爷爷每次沏砖茶都是用铁锅或氍壶现烧水。爷爷喝茶刚沏好就能喝，我问他不烫么，他说了一句俗谚：“眼睛耐冻嘴耐烧，尻（音du，臀部）子迎下洒不了”，逗得我一阵笑。不大的房间中间还有个隔断，外间有个黑棕色的躺柜，粮食和杂物放在里边。一进里间基本上就上炕了。那个年代城里也不富裕，我家拥有一台五灯收音机时，我早已过了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里孙敬修讲故事的年龄。

土房前面是个小院，院子的土围墙大约高1.2米，院子中央有个葡萄架，我爷爷一趟又一趟去村里唯一的水井担水回来浇葡萄树。葡萄藤每到夏天搭在木杆架上，枝叶繁茂，像个巨大的伞，是盛夏纳凉的好地方。到了晚秋时节，一串串黑紫色的葡萄挂满枝头。这一架葡萄和村南那棵大柳树，在我们村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葡萄根部坑洼处，还长满了豆姑娘（亦称菇蔞儿），但好看不好吃，又酸又苦，也还有点微甜。有的小孩儿嘴馋时也会吃几个。从网上查到豆姑娘学名酸浆，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植物学分类中为茄目茄科酸浆属。是一种中药材。

那时没有自来水，连轧水井都没有。村子中间有一条从东到西的土路，前几年还没有铺上柏油路面。水井就在那条路上，水井不深，老乡们都是用一个柳条编的水斗提水。爷爷的院子里还有一棵杨树，很高大，在我的模糊记忆中听说过是我爷爷年轻时栽的，后来爷爷用这棵树给自己做了一副棺材，提前为自己准备好后事。

差不多每年秋天，爷爷挑着担子或挎着篮子送来葡萄，有时用一种比较细长的口袋两边装上西瓜和香瓜，中间搭在肩上给我们送来。今天回想起来，那是怎样一种辛苦啊。从铁道北麻花板东边的公安厅大院（1956年或者1957年我母亲从公安厅调到内蒙古医学院，家也搬到了医学院）出发，跟我爷爷先步行到旧城，从北门南行到大什字，路虽不宽，却热闹异常，路两边店铺鳞次栉比，能让人感受到古城往昔的辉煌。有时到大召附近小馆吃一顿莜面，跟农村老百姓家里做的一模一样。我爷爷特别能吃辣椒，盐汤红红的。有一次去麦香村香香地吃了一回过油肉和烙油饼。麦香村是一家老店，红漆木廊过道，一间间小雅堂，古朴而幽静，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后来重建，虽然高了大了，与过去完全不同，但也保留了过去的某些风格。当然麦香村不可能经常光顾，因为那太奢侈了。前年我去麦香村特意点了过油肉，但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了。更多的是要到旧城大什字路西北侧的一家烧麦馆吃烧卖。烧麦馆的人很多，除了烧麦，还有油旋儿和黄油焙子。油旋儿是咸的，黄油焙子是甜的，我特别爱吃。——这些年呼市也没少去，不知有没有人还在做黄油焙子。跑堂的伙计用细长嘴的大水壶沏茶，远远地把一条细细的水流以一条弧线注入客人前的水壶中，然后得意地收起长水嘴壶，一点儿都不会洒在外边。烧麦馆的记忆持久地留在我的心中，以至于几十年来，只要我回到呼和浩特，第一顿早点一定会先去吃烧

麦，从没有过例外。我在品咂烧麦的羊肉馅香味时，总会回忆起我的祖父。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呼和浩特市餐饮业发展迅猛，我特别喜欢的莜面、黄米面炸糕已进入高档饭馆。如果在呼市多住几天，早晨也会去格日勒阿妈或其他奶茶馆喝锅茶、吃奶食，再泡几片手把肉。

在麦香村或烧麦馆吃完这美味无穷的一顿，兴致勃勃地随祖父回村，因为那里有安静的田园，村西的土坎（季节河流的堤岸）、村南的大柳树、叫不出名儿的野草和数不清花样的各种鸟儿、昆虫……这些快乐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一次我被村里的荨麻刺了一下，起了一个很大的水泡，疼极了，村里的小伙伴用井边的泥巴为我敷在水泡上，还真是有效。阳光强烈时荨麻并不刺人，还是很好的野菜。

1960年夏天我去爷爷家住了几天，那时还在吃食堂，打回来的饭是稀稀的小米粥和以谷糠为主的窝窝头，嚼在嘴里刺啦刺啦响。刚办食堂那阵吃的不错，当时听说有一个小名叫三大头的农民，我也认识他，是个老实憨厚又有点缺心眼的老农，一次吃包子，肚子胀得弯不了腰，头上的毛巾掉在地上，只好用脚一步一步踢出门外，再找一根棍儿挑起来。

只有一次不同。那一次让我感到了忧郁，触摸到了年迈的祖父的某种无奈。我跟随祖父到一户人家去讨要租金（应该是地租），却遭到了狠狠的拒绝。那家主人说：“没钱。”我记得祖父低声下气地说：“总得给点啊……”最近到呼和浩特市见到一位表哥，他小时候曾随他的姥姥（我爷爷的二姐）和母亲去讨要地租，只能要到两个馒头或一把粉条。

祖父于1960年初冬因肺炎亡故，可能也和那时极度营养不良有关。当时广泛流传一句话：“低标准，瓜菜代，谁不偷谁带害。”我的一位表弟年幼时也曾随他的姥姥（我爷爷的二姐）沿街乞讨。呼和浩特市有不少被称为“宽裤腿”的乞丐。

我没有见过祖母。成年后知道她叫张娥娥。对于祖母的关联记忆是我有一次见到了祖母的哥哥张老虎。老人进城到我家，给我们带来一些低档水果糖，叫我们“吃洋糖”。后来我曾在上初二时候到过祖母的娘家村——东厂克。我随表叔一起坐马车到东厂克，在表姑家住过一段时间。在表大爷家吃了一顿饭，大娘做了炒鸡蛋，里面加了不少白面，以增加数量，吃起来像烙饼。在家乡，住亲戚家会让年幼的我很兴奋。悠悠的马车载着我的少年幻想，去见那些陌生而朴实的亲人们，只有在乡村有过生活体验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温馨。我的父亲和姑姑都非常怀念他们的母亲，常说她生前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如果能活到解放一定会让她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她生前实在是太苦了。爷爷是个极端大男子主义者，奶奶不但受贫穷的煎熬，还受爷爷的欺压。

我的父亲金海如，在内蒙古也算一个名人。他的蒙古名字叫达赖（意为大海）。我出

生前的1946年他参加了革命。关于家世，我们在一起谈得不算多，但也零星地谈过一些。父亲小时家境贫寒，1938年满15岁才上了官费的呼和浩特市南文庙高等小学（简称南高，今天的土默特学校）学习蒙古语文。我小的时候，父亲几次说学校的早饭有一个小馒头和一碗小米粥，他会把一星期的馒头省下来周末给他妈妈带回去，母子俩每次都抱头痛哭。父亲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是班里的好学生，只用了3年多小学就毕业了。此后报考了一个家畜防疫处，经过一段学习，结业后到太仆寺旗贡宝力格苏木当了一年兽医。以后又到德王办的留日预备学校念书。经过考试共有36人于1943年赴日留学，父亲考入山口经济专门学校。日本投降后回国。回国后多次接触共产党，想参加八路军。呼和浩特市有个小校场，当时是蒙古军官学校，就在今天的内蒙古医学院院内，我家住在医学院时检阅台还在。父亲在随蒙古军官学校同学准备集体到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并被逮捕。因在狱中患伤寒病，险些死在狱中（狱中传染伤寒病，天天死人）。爷爷求父亲的同学的父亲（专门管理蒙古人的土默特旗政府的科长）作保，保外就医出狱，竟然靠小米粥活了下来。在母校南高临时当了一段老师。于1946年前往张家口参加了革命。

“解放后”先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部（后改为公安厅）、公安学校工作，1957年调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父亲1964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调到北京后一直从事外事工作。1980年调回内蒙古人民政府工作至离休。在工作期间，花了很大精力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在鄂尔多斯恩格贝种树的日本友人远山正瑛就得到过父亲的多方帮助。离休后凭着懂日语的优势和在日本的关系，联络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办起了日语培训中心，后发展成一家外国语学院。20多年来向日本派出3000多名留学生、研修生。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他是一个睿智而坚定的人，又是非常热心公益事业的人。

我的母亲是在革命队伍里与父亲相识、结合的。她的名字叫乌云，蒙古语意为聪慧。她来自东部的喀喇沁旗，清代属于卓索图盟，民国时归热河省所辖。母亲姓乌梁海氏，汉姓可以写作乌。乌梁海是蒙古历史上一个古老的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乌梁海部名将者勒蔑曾救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女儿嫁给者勒蔑之子，从此乌梁海部就成为蒙古历史上显赫的一支。在明代典籍译写成兀良哈。清朝成为喀喇沁三旗和东部土默特左旗的贵族。母亲幼年时随家人逃荒迁到巴林右旗。她生活过的地方叫独石苏木蘑菇齐村，蒙语独石意为铁砧，看过去是平地上凸起的一座独立的山，仿佛一个巨大的铁砧。在独石西南方向不远处，有一个小村庄叫蘑菇齐，现在已经没几户蒙古族了，当地有的人知道“蘑菇齐”是蒙语“莫日古其格”的异读。打听了一下有“水坝”的意思。村北边有一条小河，不知是否与村名有关。母亲的亲人们都先后亡故，母亲1946年参加革命后，再也没回过故乡。但母亲仍然经常思念她生活过的地方，时常提到她哥哥死得早，嫂子改嫁，哥哥有个儿子不知道怎么样了，很想帮助他。1965年随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后，没有多长时间“文化大革

命”开始了，全家迁到河南驻马店地区的五七干校数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家里稳定下来，母亲再次提起家乡，提起她的侄儿。我曾先后两次到过那里。第一次是20年前，利用出差之便到了独石，到了蘑菇齐。经过一番打听，竟找到了母亲的嫂子。这位老太太和她后任丈夫生的儿子一起生活。她告诉我和我舅舅生的儿子因为外伤感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就死了。我给那个老太太留了点钱后告辞。去年我和小弟弟金锋去克什克腾旗旅游，再次转道去了独石、蘑菇齐，我想让弟弟也看看母亲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母亲一生勤劳节俭，除工作外不但养育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还为第三代的健康成长操碎了心。母亲是一位爱心无限又疾恶如仇的人，是我们家贡献最大的人。2004年，因心脏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只有一个姑姑，是父亲的胞妹，叫金凤，20世纪50年代参加了公安工作，由一位普通民警、派出所所长渐升至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我自己对于家世的了解，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金凤姑姑那里得到的，包括这一叠契约文书。金凤姑姑曾与一位叫金晨光的研究者合写过一篇文章《土默特金姓考》，证实我家是16世纪中叶蒙古史上著名的阿拉坦汗的后裔。他们在撰写这篇文章时，还引述了契约文书的内容，但关于契约文书的重要意义，需要解读的当然还很多。在我爷爷去世后我姑姑保存了这些珍贵的文书，“文化大革命”中挖“内人党”，姑姑惨遭迫害、毒打，腰椎竟被打成重伤，但这些契约因藏在煤堆里而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前几年我才知道这些契约文书，现在暂时保存在我这里。

我爷爷的弟弟金双全，和我爷爷很不一样，比较懒，也不善于持家，但却是个性格暴烈的人，村里的老人讲过他不少打抱不平的故事。我父亲对二爷爷感情很深，在1965年举家搬到北京之前，我母亲亲自张罗为他做好了棺材和装老衣服。他老人家活到了1975年。我的爷爷还有三个姐姐，她们的后代有些还跟我家有密切的来往。

我还要简单说说我和弟弟妹妹们。我们兄弟姐妹共五个，我是老大，生于1947年，高中二年级转到北京，1968年当兵，复员后当了7年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最后从中央国家机关退休。大妹妹涛力生于1950年，初中毕业后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几年，返京后先当工人，后在一家旅行社工作，通过了若干门自学高考，也已退休。大弟弟金铮生于1953年，初中毕业后到河南五七干校当两年工人，1970年底又到部队当兵5年，复员后在一所设计院工作，在此期间到日本留学5年，回到原单位从事对日贸易至今。小弟弟金锋生于1956年，随父母到河南干校，在农村中学上学，回京后读完高中到农村插队。分配工作后经过努力学习，终于有机会赴日留学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是中国科学院一家研究所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小妹妹金小红生于1958年，从河南回北京后也是上高中插队，跟我同一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做过一段律师，现定居

日本。我们五兄弟姐妹已有下一代六人，或大学毕业或在上大学，其中一人获博士学位，一人获硕士学位。

我家的故事讲到这里该结束了，但还有些话要说：

2006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位蒙古族作家，叫杨道尔吉。他生在鄂尔多斯，却从少年时就生活在土默特，对那一带很了解。1999年他创作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是较早用汉文创作同类题材的青年作家。虽然我长他十七岁，但我们却是非常默契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谈祖国，谈民族，谈历史，谈未来，也谈各地的风土人情，相互补充，相互启发。这位年轻人的勤奋和执著上进让我感到很欣慰。就在父亲米寿之日后不久，我决定把这叠契约文书的影印件交给他，并邀请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一篇文章来。我相信他能表达出更为丰富的感受，同时我也希望通过他的文学作家而非专业学者的解读，对家乡、对祖先历史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更深入的研究就要靠专家学者了，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以及多位亲友在期待着……

铁木尔

二零一一年七月于北京

等待被唤醒的真实

杨道尔吉

2011年6月18日上午，在北大医院的干部病房里，我再一次诚恳地试图谢绝铁木尔老友的邀请，结果没有成功。他的邀请对我的能力是一次挑战，我自己的知识储备让我没有信心接受这一邀请——铁木尔先生要整理出版家藏的契约文书，约我写一篇文章。回到呼和浩特后，我又一次仔细地阅读了那些契约文书，并参阅了金启琮、黄时鉴、晓克、牛敬忠诸位学者的文章，愈加缺乏勇气了。然而，铁木尔先生率直而真挚的目光不时从遥远的北京穿射过来，让我无处躲藏。我终于下定决心：不装了！写出什么算什么，给铁木尔老友回报一份真实的心意。

2006年，我认识了铁木尔先生，他当时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7月份，我去北京拜访他，托他帮忙办事；9月，他来内蒙古考察，我陪他拜谒成吉思汗陵，兼作导游；12月，他约我到北京，让我参加一个电视专题片的创作。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他既景仰又敬重：他是一个干练且拥有丰富思想的官员，在他的身上甚至可以找到军人的气质。

由铁木尔先生主持的那个电视专题片后来定名为《蒙古高原之歌》。在电视专题片的编创过程中，他授予我更多的发言权，鼓励我坦诚地表达出自己对于蒙古历史文化的想法，并且更多地采纳了我的建议。2007年春天，我作为撰稿人与摄制组一起采访了很多蒙古文化学者，这使我倍感骄傲。从2007年年初开始，我们之间的交往频繁起来，我敬重他的谦和，敬重他的渊博，更敬重他的真实和坦诚！

毫无疑问，此后我们深入交往的基础是我们共同关注着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并且在交流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一种真诚和率直的方式。此外，铁木尔先生豁达而坚韧的品格让我钦仰不已：他患有包括肾癌在内的多种疾病，而我几次到医院的病房里看他，即使是手术后的第二天，他照样谈笑风生。

2011年4月2日，我从铁木尔先生处拷贝了这些文书的影印资料。共有240多件。这些文书中的绝大部分为契约文书，还有为数很少的房屋执照和法院判决文书等；文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但其中有3件完全用蒙古文书写的契约文书，有13件汉文夹注（或旁注）蒙古文的文书，有1件为汉文旁注满文文书。

本组文书中大部分为土地契约，极少数涉及借贷、转佃及确认民法关系的契约文书。时间跨度从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到1957年，历时185年。文书涉及的土地契约主要有两类：其一为耕地租佃（售）；其二是建筑用地基（房基）租佃（售）。根据契约标的

所反复阐明的地点（主要为云社堡村、毕克齐村、甲浪板升村、归化城道西、北栅外公主府路等），可以大致确定全部土地契约的主约人之间存在物权共有及合法继承关系。从历时的185年间出现的不同主约人关系判断，很有可能构成宗亲链。

可以确知的主约人间的关系为：

1. 见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至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的三皇保（三黄保、三黄宝）是台吉凌丹嘎兰达的孙子（参见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契约）。“嘎兰达”在土默特旗为参领（或佐领）章京的另称，另有嘉庆十五年的蒙古文文书可以佐证为参领。蒙古语“凌丹”（Ligden）有时可以译写成“捏圪登”、“力格登”、“聂格登”。因此，见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契约的主约人“捏圪登”可能就是台吉凌丹嘎兰达。

2. 见于1851年（咸丰元年）至1885年的金贵、金宝或疑为同一人，参见1863年（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契约，该约称金宝乳名为五十四；1885年（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契约又称金贵乳名为五十四。或许是某一次误写。

3. 1858年（咸丰八年二月廿四日）契约标明：金玉、金宝、金贵同列，应为弟兄。该契约首次用汉文表达三人的母亲为金氏，前此则被称为丹府三太太。

4. 见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至1953年的达木欠是金宝之孙，参见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契约。

5. 见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官印保（观音宝）是达木欠之父，参见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五日、初八日）两个契约文书。由此推知，金宝是官印保的父亲。

6. 达木欠生于1895年或1896年，参见1950年12月20日的法院判决文书。根据铁木尔先生的记忆，他的祖父达木欠属猴，当生于1896年。

7. 达木欠有一个弟弟，名双全尔。

从官印宝成为主约人后，金氏标志很少出现。但在民国时期的96份文书中却有3处：

①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0月27日契约的主约人为蒙古金万福，出佃土地位于甲拉板申村西北（6亩）。

②1940年（契约标明系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五年）契约的主约人并列为打木气（达木欠）和金宝义，出佃房地基，标的因文书残损不明。

③1941年（成纪七三六年）1月20日契约主约人为金万福，出租房地基位于厚和市（归化）营坊道半道街坐北朝南空地。根据契约文书书写惯例，可知达木欠与上述同时期的金氏之间存在宗亲关系。而据铁木尔先生的记忆，金万福（富）就是达木欠。

从以上梳理的线索，再加上必要的推测，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铁木尔家庭的简要谱系：

凌丹（捏圪登）嘎兰达→？→三皇宝→金宝→官印宝→达木欠→金海如→铁木尔兄弟。

捏圪登之前还有一位名叫“公庆”的主约人，对云社堡村水地行使出租权利，参见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廿五日）契约。公庆是不是捏圪登的父亲，因为没有更丰富的佐证，不好确定。

金氏（阿拉坦氏）家族是蒙古族。他们的家园在归化土默特。我们从金氏家族的这一组契约中可以追想到阴山前后的这个归化土默特蒙古的历史，因为土默特蒙古的历史在整个蒙古历史中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1582年1月13日（明万历九年腊月十九日），土默特部领主、蒙古历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阿拉坦汗逝世了。他在位时，曾使阴山前的土默特开发了板升农耕经济，并且因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广建寺宇，形成了城市的雏形。阿拉坦汗去世后，土默特的政局出现动荡，统一力量受到了瓦解。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6月，长期主政土默特万户的阿拉坦汗的侧夫人三娘子也病逝；到17世纪20年代，土默特万户已经进入了“散弱”的状态。1627年，新崛起的蒙古察哈尔万户林丹汗西迁进入土默特。经过连续五年的侵夺战争，1632年春林丹汗在后金皇太极的追击下，驱赶着大量土默特部众和牲畜西走青海。而皇太极的军队到达土默川后，下令烧绝板升（村庄），只保留了一些寺庙建筑。1632年夏天，土默特部主俄木布（阿拉坦汗六世孙）四处搜寻3300余丁，降附了后金。金氏家族的先人就是这幸存在故地的3300余丁中的一位。

随着清康熙朝对噶尔丹战争的深入，17世纪80年代开始，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出现了军垦和为远征漠北军队提供服务的商人，内地汉族移民“寄民落籍”，为清朝的统治需要服务。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清廷决定在归化城一带筑城屯田，以就地筹糈，呈报开垦的规模达4万顷。接着就是1736年（乾隆元年）的更大规模的招民垦殖。

在对归化城土默特的土地资源疯狂侵吞的同时，清廷鼓励兴建格鲁派寺院，进一步利用藏传佛教控制土默特部众。致使在清朝入关的百年之内，人丁并无显著增加（1742年归化城土默特两翼43559丁）。从1742年（乾隆七年）到1749年，基本完成了土默特蒙古丁户口地的调配。我们在金氏家族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早期的契约标明“户口地”字样，晚期（清光绪朝以后）只说“祖遗”。

那么，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丁在他的“户口地”上耕种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按照清初制度，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丁经常被征行军。他们一旦被调出征，军马、器械、口粮全部需要自备。因此，他们无暇耕种自己的户口地，而又不得不利用“户口地”出租来保障出征的费用。金氏家族的契约文书里早期经常出现“因差事紧急”字样。所谓“差事”，大抵就是出征打仗。

金氏家族是幸运的。凌丹嘎兰达和三皇宝老爷在归化城置有地业。最早明确标明在城里对地基行使权利的是1834年（道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约条，标明三皇宝出租归

化城大西街二道罗门的地基。此条契约旁注：道光五年曾经有租约。说明金氏家族在嘉庆朝到道光朝时期开始上升，并有可能是显赫的。

铁木尔先生回忆说他少年时曾经去过祖父达木欠务农的村庄。2011年5月20日我驾车到了那个村庄（现在已经被包在呼和浩特市西二环以内），地名叫“当浪土牧”，似乎依稀可见村庄的影子，在呼和浩特电厂的高大烟囱映衬下，显得有些局促。然而，我们在金氏家族契约文书中，没有找到任何人对当浪土牧的土地行使出典权，只是1950年代的契约文书中指称达木欠是“当浪土牧村农民”。这是为什么呢？铁木尔先生告诉我：祖父达木欠幼年因父亲早亡，家境贫困，与幼弟双全儿随母回到母舅家的村落居住，就是当浪土牧。此事应当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左右，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此时距离金氏家族发达的道光朝不过50年。这期间该有多少故事啊！

2011年5月我独自开车到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北票市进行文化考察。那里是清代外藩内札萨克土默特左、右旗的辖地，与归化城土默特有亲缘关系。那里同样是阡陌纵横，农业形态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已经深深地印在蒙古文化之中。他们和草原深处的游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明代以来较早聚居并创造近代边塞城市的蒙古族先驱。

历史的进程滞重而诡异，而解读历史则常常被赋予历史后的情绪。家族契约则无疑是最真实的信物，它躺在历史巨流的泥沙下面，等待被唤醒！

目 录

我的亲人和家传契约（代序言）.....	铁木尔 1
等待被唤醒的真实	杨道尔吉 1
乾隆年	1
嘉庆年	7
道光年	9
咸丰年	19
同治年	37
光绪年	51
宣统年	115
中华民国	123
新中国契约	221
蒙古文契约	245
蒙古文契约汉译	万喜 252
专家推荐意见书（一）	达力扎布 254
专家推荐意见书（二）	万喜 255
概述	青格力 256
后记	258

乾
隆
年